

历史影像



1956年春，李英男（左）和妹妹李雅兰穿着苏联校服和妈妈合影。（左图）



1975年，李英男带着儿子巴沙到运城看望妈妈。（右图）



全家福。李英男、李雅兰也分别组成了“国际家庭”。（左图）



1999年，李英男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。（右图）

## 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李英男一直记得母亲的话：“在我的眼中，立三只是一个诚实可爱的青年。”1936年2月，在莫斯科共产国际“柳克斯”公寓里，李立三和丽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按照苏联的传统，女人出嫁后改用丈夫的姓氏，“父亲根据母亲的苏联名字‘丽萨’，给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——李莎。”

# 相簿里的一段家国情缘

□ 本报记者 赵琳



李英男在回忆录《红莓花儿开》签售现场。

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，一本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的女儿李英男撰写的回忆录《红莓花儿开》近日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。书中，一幅幅珍贵生动的老照片，深情讲述了一个普通又特殊的中俄家庭波澜起伏的往事。11月初，李英男携新书在山东书城与读者见面，记者对她进行了采访。

##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书

76岁的李英男有着让人惊叹的年轻与活力。10月31日，她在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俄语系的学生进行了交流，11月1日，又来到山东书城与读者见面。马不停蹄的行程，她乐享其中。

说起写作这本《红莓花儿开》的初衷，李英男说是因为自己从小记得高尔基的一句话——“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书”。“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可以让后人了解历史，了解老一代人走过的道路。同时，今年也是我父亲120周年诞辰，这本书，也是给父亲的一个献礼。”

谈起父母，李英男脸上洋溢着钦佩的神情。“父亲一生历经坎坷，在他背后，有一位默默付出、坚守的女人——我的母亲李莎。”李英男对父母最深刻的印象，就是他们之间“无限的恩爱”。

李英男口中的父亲，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。李立三原名李隆郅，湖南醴陵人。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，192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父亲身上有很多“标签”，但在李英男眼中，父亲是浪漫主义的、理想主义的。

“我几乎可以想象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代表人物，他们的理想主义，他们的艰苦探索，他们的风风雨雨，他们的千锤百炼。父亲母亲的跨国婚姻，更是历史的波澜壮阔与惊涛骇浪的大画卷里的动人风景。”李英男动情地说。

“印象中父亲每次回家，推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：‘你妈妈在吗？’然后便开始呼唤母亲的名字……他们之间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，这种情感在如今很难得一见了，母亲是父亲最贴心的知己。”

李英男的母亲是俄罗斯人，原名叫丽萨·基什金娜。到中国后改名李莎，“母亲十四五岁就开始工作了，帮她姥爷家，父亲和母亲相



李英男，著名教授、翻译家。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院长、北外俄语中心主任。2003年—2007年担任中俄友好、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委员。2002年至今担任中俄友好协会常务理事、顾问。2018年9月获俄罗斯外交部国际合作署“友谊与合作”荣誉奖章，2019年6月荣获“中俄互评人文交流领域十大杰出人物”称号。

识相恋也历经坎坷，在苏联期间，父亲还曾受到诬陷进过监狱，母亲成了他很重要的精神支撑。所以他们俩有着很强的情感基础。”

说起父母的往事，李英男的眼中闪烁着光彩。老人脸上满是从容和享受、感激。在济南与山大学子的交流中，她脱口而出的流利俄语，在俄语、西班牙语、中文之间的流利切换，让人心生敬佩。她婉转的交谈中，一段段家国情缘缓缓铺陈。

在《红莓花儿开》一书中，有一段作家王蒙对李英男的描述，读来让人印象颇为深刻。2007年9月，在俄罗斯“中国年”的一项重要活动上，王蒙邂逅了一位精神奕奕、美丽端庄、大气英气志气焕发的女士，她担负着一批中国作家充当翻译的工作。“与一般侧耳倾听、拼命捕捉语义、苦思冥想对方语言的对应路径的译员的吃力举止与表情不同，她显得游刃有余，乐在其中，对于中俄的书籍交流、文学交流、人员交流，她非常享受，有一种自若

感。”同行的作家迟子建也表达了对李英男风度风采的赞美。

“你看这张照片，是我9个月大的时候，照了人生第一张照片，而这张照片背后，还有一个故事。”轻抚老照片，说起往事，李英男滔滔不绝。1943年8月，苏联卫国战争正经历着激战残酷的阶段，李英男在莫斯科呱呱坠地。

“有一天我父亲突然间急急忙忙想起来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早就出了百日了，还没给她照相呢，抱起我就去照相馆，到了才发现我的一只小鞋掉在半路上了，所以这张照片上，我有一只脚是光着的。”

一张李立三、李莎、李英男一家三口的全家福里，母亲一脸忧郁。李英男说，1946年父亲回国前，一家三口拍了一张全家福，母亲因为不知道何时能到中国和父亲团聚，倍感惆怅。“从1946年春天开始，妈妈一直在争取到中国和父亲团聚。大概是1946年9月初，哈尔滨来了人，来的是著名的将领罗荣桓和他的夫

人。在这之后不久，妈妈就获得批准，带着我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。”

## 父亲母亲的跨国之恋

回眸岁月峥嵘、浪涛汹涌的20世纪，其历史画面不仅由改变世界的划时代事件所构成，其中也穿插交织着诸多的个人命运和小家故事。一滴水能够映照周围万物。一个人、一个家庭的生活能反映历史的重大转折，成为历史变迁映照下的家庭史诗。

俄罗斯歌曲《红莓花儿开》讲述的是一个少女的心事。八十多年前，一个俄罗斯姑娘，正如歌中所唱，爱上了一个青年，后来为他告别祖国，为爱情远行。

1933年初秋的一天，被派到苏联学习的李立三，到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朋友杨松家做客，一个俄罗斯少女敲门走了进来。这个活泼可爱的俄罗斯少女名叫丽萨·基什金娜。“叫丽萨”好了，”少女微笑着说。

李英男说，第一次见面，母亲说她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，只是觉得他是个话语不多的中国青年。后来，恰逢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，父亲邀请她和很多中国朋友一起欢度节日。在餐桌上，父亲与大家有说有笑，气氛很热烈。母亲虽然不懂中文，但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周围人的影响力，被他的魅力深深吸引。不久，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。

李英男一直记得母亲的话：“在我的眼中，立三只是一个诚实可爱的青年。”1936年2月，在莫斯科共产国际“柳克斯”公寓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，李立三和丽萨举行了婚礼。婚礼很简单，只有陈云、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和女儿翟独伊等十多名来宾参加。按照苏联的传统，女人出嫁后改用丈夫的姓氏，“父亲根据母亲的苏联名字‘丽萨’，给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——李莎。”1943年，她们的大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了。

1945年，李立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，并于1946年初回到中国。1946年9月，李莎带着李英男，经过十来天的颠簸来到哈尔滨。来到中国后，在李莎的多次要求下，她被安排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。1948年，李立三和李莎的第二个女儿李雅兰出生。在哈尔滨平静生活近三年后，1949年3月，全家迁往北京。

这是李立三一生中的辉煌时期。李英男收藏着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：“开国大典，毛泽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父亲就站在毛主席旁边，中间只隔了一个人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照片中的父亲都被‘截’去了，好在后来还原了历史。”

2015年，李莎去世，终年101岁。“母亲是中国籍俄罗斯人，著名的俄语教育家。她一生为中俄交流，为中国俄语人才培养倾注了无数心血。”李英男对于一张母亲台灯下伏案写作的照片，轻声回忆着——

母亲李莎1914年出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，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。先后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、北京俄语学院、北京外国语学院、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。曾任中国俄语教学研究会、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、中俄友好协会理事等职，系中国老教授协会名誉理事、全国政协委员。

“很多人说母亲对于俄语教育的热情，对于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敏感，让她成为新中国俄语教育当之无愧的奠基人。但她对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母亲，是时代浪潮一次次冲刷之下依旧坚韧而优雅的母亲。”

## 国际家庭传递世代友好的颂歌

“我们这个家经常被人们称为国际家庭，这一点不夸张。我父母在苏联结婚，所以是一个跨国婚姻，家庭自然就是国际家庭。”李英男说。“到哈尔滨后我又有了一个妹妹，所以在哈尔滨我们是一家四口的小家庭，但是1949年我们搬到北京后，就从一个大家庭变成了一个大家庭。”

李英男告诉记者，父亲李立三一生共有过四次婚姻，他的屡次婚变与那个时代的背景和革命动荡不安的生活相关。第一次婚姻是李立三的父亲亲手包办的，妻子林杏仙为他生了儿子李人纪，不久便患风瘫去世。第二位妻子叫李一纯，两人共同生活5年后，李一纯离开了李立三，他们生有一子李人俊。李立三的第三位妻子李崇善是李一纯的妹妹，她与李立三

# “我是一个有俄罗斯情结的中国人”

□ 本报记者 赵琳

《红莓花儿开》一书中，一幅幅老照片，以19篇文章依次加以解说，串联出一个中俄跨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个人的成长经历，折射出两国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大起大落，80年代以后平稳向前发展的历史变迁，谱写了一段休戚与共的中俄关系史话，见证了深刻难忘的中俄情缘。通过阅读这本书，通过与李英男老师短暂的会和微信交流，记者深深感受到了她赤诚的爱国情怀。

在回忆童年时，书中有一段话这样描述：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爸爸送给我一个拼图……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湖南，因为爸爸经常提到湖南是他的家乡，也算是我的籍贯。”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心灵深处就植入了“中国”的种子，她对中国的认知和热爱开始萌芽。

其实，生长在这样一个跨国家庭中，有两种母语、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，逐渐会面临一个认同问题。在书中，李英男十五六岁的时候产生困惑，自己究竟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？因为感知自己并不完全是俄罗斯人，也非完全的中国人。未知的归属感令她困惑。

“那时候，母亲希望我能留在莫斯科继续升学，进入莫斯科大学，因为留苏非常光荣而且前途无量。但年轻的我已经在困顿中不知不觉作出了人生选择，明确了国籍和民族属性。”李英男说。

选择认同中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，首先就要把中文学好。李英男学《俄汉字典》，进入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班学习汉语，刻苦读书，提升汉语阅读和写作能力。1962年考进北外西班牙语专业，与同学们融洽相处，还下过乡一起劳动。

“通过各种锻炼，我摘掉了‘洋小姐’的

帽子。”她调侃自己。

几十年来，李英男在中国找到了发挥专长的领域，完全融入中国社会，更成为中俄友好和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使者，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。

在《红莓花儿开》一书《我是中国人》这一篇文章的末尾，李英男用一句话作概括：“我是一个有俄罗斯情结的中国人。”

李英男坚定的中国情结令人敬佩和感动，她在寻求认同的过程中，从语言沟通到生活习惯，一步步适应两种文化差异，努力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中国人，其中的艰辛唯有亲历者可知。

须知在当年，中俄两国在经济程度、国际地位诸多方面是有显著差距的，可中国这片土地上，有挚爱的双亲、兄弟姐妹、同窗友人，割舍不断的人际感情让她倍感温暖和亲切。这也正是她初心不改，钟情于中国，毅然选择自己的中国人身份的重要原因。

在书中，《妈妈的抉择》一文专门写到母亲李莎从苏联国籍转入中国国籍的曲折经历：促使她鼓足莫大的勇气，作出这种艰难选择的是她对中国的感情，对父亲的依恋。20世纪70年代，李莎在山西运城居住，接触了当地普通百姓，学会养鸡、垒鸡窝、生炉子，逐步适应了中国习惯，汉语水平也有了提高，回到北京，她越发深切感到自己已经融入了中国的圈子。偶尔回莫斯科的时候，也要迫不及待地回来，她说：“我要回家，我想家了。”在她心目中，中国就是她的家，她的家在北京。

近年来，中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，形势趋向多样化，李英男经常参加各种民间文化交流活动，这是她生活中的重要内容。“我的老伴